



政治经济学以及对 历史的比较认识

当前一代的政治学家费力地讨论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学。经济学家对平等条件下或不平等条件下的发展前景进行辩论。许多人承认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贡献，但多数人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而主张把政治学与经济学分开并避而不谈国家、权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建设性地讨论这些问题，就要求批判地关注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分析的贡献。

本书是我 1981 年《比较政治学理论》一书的续篇，该书作了较大的修订，并在 1994 年出版了第二版。它的任务是评估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的一般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范式的背景，以及鼓励学生与学者重新观察看来已解决的问题，对既定的理论与概念进行挑战，并探讨研究新的领域。它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与韦伯，视他们为系统、国家、文化、发展与不发达问题的先驱思想家。它的结语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在这里作为本书的出发点。

该书提出的主题都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封建主

义和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级，国家，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理论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民主。

我的著作同最近一部综合政治经济学认识的作品有所不同。卡波拉索和莱文在 1992 年研讨了大量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识别并简要发展一些主要的概念，并对一些对立的观点进行思考。然而，他们的重点是在主流观点而不在可供选择的其他观点。他们对国家、民主以及其他问题的处理，如果更仔细地关注阶级分析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可能性，将会得益匪浅，而本书设法推进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则对上述问题及其他许多问题深为关注。

为了寻求一种新的系统阐述，本章一开始就对许多年来各个思想家对政治经济学的设想进行历史的综述。它描述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辩论与定位对社会科学、特别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总的影响，并接着讨论形成我们对当代重大问题看法的若干思想。然后，它转而说明比较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方法。最后，谈谈若干理论架构中重要的比较研究的结果。

一、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与演变

政治经济学起源于 18 世纪末重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不但包括马克思，而且包括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这些思想家集中关注主要在迅速发展中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及其演变，特别是在英国。从古到今形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思想学派是：

小商品主义

重商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边际主义

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主义

后凯恩斯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

我对这些学派的概括必然是扼要的，并参照了罗纳德·米克（1956）和欧内斯特·曼德尔有益的综述，它将作为了解今日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指南。

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史学家把政治经济学溯源于小商品生产，其时货币出现，物价波动，有些生产者陷于债务，原始公社关系开始解体。中国的孟子和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首先试图说明伴随小商品生产而来的不稳定并代表公社社会寻找克服之法。他们承认分工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而亚里士多德特别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孟子认为农业劳动是价值的来源，而柏拉图接近于提出同样的理论。小商品生产在中世纪的发展促使经院神学家艾伯特斯·马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纳斯讨论价值问题。例如，阿奎纳斯寻求一种公平的价格，从而认可商人的利润并保护既有的商业秩序。这种公正价格的中世纪概念最后在国际贸易面前失去了意义。另一位经院思想家邓斯·斯科特斯研究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价值理论，一位伊斯兰哲学家阿布德—阿尔—拉赫曼—伊本—卡尔邓阐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在 14 世纪至 17 世纪之间，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财富在非人格化市场体系中的性质。这个时期的标志是：新地理区域的发现和征服，资本从新世界流入流出，一批君主和商人兴起，他们推动民族主义，打破地方商业障碍，从对外贸易以及教会和贵族旧秩序势力的削弱中得益。当时的重商主义著作实用主义地分

析国富之道，指出重要点是国际收支盈余、贸易收支顺差、制造业以及土地肥沃。早期重商主义者以商品流通来描述经济生活，而 17 世纪后期与 18 世纪的作家们都谈论制造业增长和农业技术发展这些日渐明显的社会剩余产品问题。出现了两种政治经济学派系。一种是英国学派，以威廉·配第为代表，他在《政治算术》（1651）一书中分析剩余价值源于农业。法国重农主义者则构成了另一派。皮埃尔·布瓦吉耶贝在《法兰西国内经济》（1695）一书中集中把农业劳动作为价值的惟一来源。弗朗索瓦·魁奈在他的《经济表》（1758）一书中反对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来自贸易，强调农业所产生的盈余。他主张赋税应由土地所有者支付，而不应由小农、商人与制造业者支付，他认为后者都是生产性的。最后，尼古拉斯·巴邦在《论贸易》（1690）一书中把商品价值联系到制造货品的费用并强调公共利润，米克认为（1956）这代表着从重商主义向亚当·斯密等人的古典观点的过渡。

古典自由派相信私人财产应予保护，财富生产是根据财产权逐步灌输给个人的工作激励为基础的。因此，个人首创精神必须不受重商主义的约束。这些概念都来自英国思想，特别是达德利·诺思著作中对自由贸易的主张以及约翰·洛克关于生产是个人努力满足人类需求的结果和工人应能使用或消费自身产品的思想。

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巩固了这些思想。在他的《国富论》（1776）一书中，他同时提出了商品、资本与价值以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等主要论题。他是系统制定劳动价值理论的第一人，使之有可能识别商品价值中的劳动量。他确定市场法则来说明竞争中的个人利益驱动，并设想了竞争性的市场均衡。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71）一书中既作为亚当·斯密的门生又作为亚当·斯密的批评者，为政治经济学的精细阐述作了贡献。李嘉图主张资本积累是经济扩张的基础。

他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相信分工与自由贸易政策将造福所有国家。他把亚当·斯密关于有序增长和市场均衡的思想同国际经济体系相关联。他还注意到地主利益（反社会的）与资本家利益（亲社会的）之间的冲突。他的解释影响了社会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解释，特别是他的以下观点：任何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量，社会劳动分布于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

其他古典自由派还有托马斯·R. 马尔萨斯和杰里米·边沁。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一书中对政治经济学贡献了一项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繁殖快于粮食生产，所以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大规模饥馑和死亡。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一书中认为人的自私是自然的、可取的，但他相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应是一致的。政府行动只要并非迎合特殊集团的狭隘利益，就是可取的，在道德与法律约束框架内应当容许有个人自由。

李嘉图对劳动和生产的深刻认识以及马尔萨斯悲观的预测，激励了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罗伯特·欧文力主劳动改革，包括缩短工作日、禁止童工和促进乡村合作社。克洛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德·圣西门伯爵是一位贵族，后来被贬降为平民，他相信工人应得社会的最高奖赏并主张重组社会。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一书中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他追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道路，但把重点放在生产上而不在分配上。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则批判当时的正统经济学。

卡尔·马克思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自由派的理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及综合理论以说明阶级斗争。他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利润率下降的倾向。他的早期著作抨击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后期著作抨击古典自由派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和

亚当·斯密。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他揭露了普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论证了人们应研讨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并且认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形成一个整体。

边际主义价值理论和新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是回应这三大流派而出现的。边际主义者在均衡分析中寻找“边际”性。新古典主义者试图做到严格、详细和抽象，他们强调均衡，也因此往往为未曾说明影响均衡的动荡与结构危机而受到批评。

在大萧条以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把政治经济学从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位置转移到重实效的位置。现在不是要对资本主义从理论上加以认可，重要的是通过减轻周期性波动起伏的程度从而在实践上保存资本主义。凯恩斯的信徒保罗·塞缪尔森等人直到今天一直坚持这种宏观经济传统。

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是解释而不是预测，集中于历史与体制，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进程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分析的基础应是生产而不是交换，重要的是长时期的不均衡和变化而不是均衡和稳定。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和 M. 卡莱吉获得学术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恩格斯编辑并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然后考茨基编辑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史》。扩大马克思早期贡献的其后种种努力包括：考茨基对农业中资本主义的论述，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1913），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斯大林主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减少了，但是大约在 1960 年以后，保罗·巴伦、利奥·休伯曼、哈里·麦格道夫、保罗·斯威齐以及全世界数以百计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了这方面兴趣的再次上升。

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可能都有用处。例如，古典派政治经济学家的影响在最近的辩论中

很明显，诸如罗伯特·布伦纳（1976）对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以及对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有关不发达问题早期思想的挑战。

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研究中强调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态及生产方式，就有可能使经济学家的研究同社会物质基础结合起来，使政治学家的研究同政治上层结构结合起来。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以及国家与阶级理论应当都成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工具。

二、分类理论

政治经济学中固有的学术分野，特别在 20 世纪期间，反映了西方哲学的思潮，波林·罗西瑙（1988）对此综合为浪漫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浪漫主义指的是与我们思想观念有联系的理想主义。它设想人类与大自然有质的不同，设想人类价值观以个人自由与个人认识为基础。知识以总体为前提，反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可以看到事实与价值观是相关的。在方法论上采取名义概念而不是实际概念，采取目的性解释而不是原因性解释。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批判理论家，诸如于尔根·哈贝马斯和迈克尔·勒维；有新黑格尔主义者，诸如格奥尔格·卢卡奇；有存在主义者，诸如让·保尔·萨特；还有弗洛伊德主义者，诸如赫伯特·马库塞。

与此相对比，经验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强调量化与唯物主义。它设想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行为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理性主义是经验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折衷。它的方法论既非宿命论的又非唯意志论的，是后实证主义的。它的支持者包括奥地利派马克思主义者如鲁道夫·希法亭和卡尔·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和第三国际的尼古莱·布哈林，加上当代的理论家如拉尔夫·米利邦德、保罗·巴伦和保罗·斯威齐。

理性主义追求原因性和结构性解释，更多依靠理论而不是数据，它从理智、论证和学术思考中吸收知识时是客观的，通常是演绎的。与这一思潮相联合的有受路易·阿尔都塞影响的结构主义者如尼科斯·波朗查斯和格兰·特尔博尔恩，其他结构主义者如克劳斯·奥费，以及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如乔恩·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

这些思想型式与学派反映了分野与分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一致共识很少，众多学派常有，尽管声称并非如此（表 1-1 和表 1-2）。在特定的民族传统内可以注意到不同的潮流，体现在马克思和卢卡奇早期著作中的个人认识与异化思想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革命派思想的唯物主义集体观相并列，后者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国际运动，最终导致了斯大林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教义。

循此以往，一位法国哲学家和共产党人路易·阿尔都塞鼓动一代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忠诚。阿尔都塞试图拯救马克思主义，同时设法超越经济主义或技术决定论，以及人道主义和历史循环论。在《为了马克思》（1969）一书中，他提出了自身牌号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力的、中肯的批判。他的信从者之一尼科斯·波朗查斯走向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导致当代对于新社会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视。这些作家们虽然都对旧正统挑战，然而他们仍然坚持结构性观点并且像马克思那样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深入分析社会问题的框架。其后的 10 年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觉醒，但是迅即陷于危机，那是阿尔都塞自己在 1977 年 11 月的一次惊人声明中宣告的，最后被东欧与苏联的所谓共产党政权的跨台所证实。格雷戈里·埃利奥特（见参考书目，1987 年）对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得失作了权衡，列出了在研究与写作方面受阿尔都塞影响的学者们的长长名单。南希·哈索克在评估阿尔都塞思想中的结构性马

表 1-1 思想型式与马克思主义学派

主要思想型式	有关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浪漫主义 知识是总体的 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哲学 着重个人自由与经验 人类与大自然分野 名义概念而不是实际概念 反对事实与价值观区分 目的性解释而不是原因性解释	哲学的 批判理论家 南斯拉夫实践派 法兰克福哲学家 现象学派马克思主义者 新黑格尔派 弗洛伊德主义者 存在主义者 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
经验主义 以观察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对人的行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唯物主义的 苏联（1920 年以前，50 年代后期） 1930 年以前的法兰克福学派 第二与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 当代唯物主义者
理性主义 演绎法说理 既非宿命论又非唯意志论 后实证主义的 理论而不是数据	结构主义 进步的非马克思主义者 阿尔都塞派马克思主义者 非阿尔都塞派马克思主义者 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

来源：参照罗西瑙 1988，第 423~454 页

克思主义时，认为他的著作构成了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后来所走道路的第一步，她在评述他著作中三个主题时批评了这些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那三个主题是：过于武断的最后实例与概念、科学与意识形态以及理论的反人道主义。她着手就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工作与政治实践的强调加以平衡（见参考书目 1991 年），并且对被刻划为阿尔都塞破坏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特点加以纠正。

表 1-2 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趋向

主要国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		东方马克思主义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俄国
先驱者	卢卡奇(匈牙利)	格兰西	科尔什	列宁 托洛茨基 斯大林
非马克思主义影响	马克斯·韦伯	克罗塞	海德格尔 拉康	斯大林主义的 巩固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	马库塞	德拉·沃尔佩	萨特 阿尔都塞	
批判性理论	从马克思及其早期著作 法兰克福学派 霍克海默尔 哈贝马斯 卢卡奇			

在第三世界中出现了类似的马克思主义和新理论的复兴。这也表现为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正统与传统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满，特别在拉丁美洲，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信仰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研讨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带来曾在西欧和美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里的先驱者之一小卡约·普拉多像阿尔都塞那样是个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共产党人，起来反对他的党的老观念，寻求了解他的祖国巴西为何落后，为何只有有局限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整个 20 世纪，有着多次民众复兴与失败。虽然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得以保持，从 1918~1922 年在奥地利、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造反却最终屈从于法西斯主义。同样，法国与西班牙的人民政府也在 30 年代后期倒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到 1945 与 1946 年就消失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老的西方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反对改良主义，他们的群众性共产党和僵硬的斯大林化结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随着斯大林在 1953 年的去世、共产国际的结束、官僚主义精英的不让步、政治与经济开放的尝试。这些运动也衰落了，最后在柏林墙倒塌以及 1989 年与以后的群众造反中终告崩溃。

没有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或主义是必定正确的。思想可以产生许多观点，主导观点不一定有助于比较分析。例如，当一种观点占了上风，它可以把竞争的或可供选择的看法挤走。波林·罗西瑙根据四个主题把主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分类如表 1-3。

表 1-3 马克思主义诸方向

批判主义	分析性个人主义	唯物主义	结构主义
早期马克思		成熟马克思	
卢卡奇	萨特	列宁, 斯大林, 托洛茨基	阿尔都塞 波朗查斯
法兰克福学派 (人道主义的, 异化)	科恩, 埃尔斯特 (方法论个人主义)	科恩 (功能主义的)	雷斯尼克与沃尔夫 (新结构主义)
拉克劳与穆菲 (后马克思主义的)	罗默 (理性选择)		
哈贝马斯, 鲍尔斯与金蒂斯 (后自由主义的)	普齐沃斯基 (个人选择)		
	赖特	赖特 (矛盾定位)	

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或主义，并不是在研究上与西方政治思想分离并有质的区别。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倾向提出的观点都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倾向相对

应”（1988 年，第 445 页）。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研究逻辑应使非马克思主义者感兴趣，而马克思主义者应承认来自非马克思主义一方的影响（佩里·安德森在 1983 年就提到过拉克劳对阿尔都塞的影响、韦伯对卢卡奇的影响、以及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种有别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对哲学、方法与研究的统一观点”（第 424 页）。

进步思想家的用语请见表 1-4。不同思潮的内容往往显示对这位或那位理论家的偏好。例如，特别受社会经济基础影响的人都以物质基础和生产力为中心来进行阐述，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人则会强调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国家及其机关部门。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表现为完全相反或者是二分法，但有效的分析则会设法把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在政治讲话和社会科学语汇中显示出许多其他区分，如：经济主义对唯意志论，阶级对集团，先锋队对各力量联盟，民主集中制对各种观点多元主义，中央计划对自由市场。马克思曾经花相当工夫来说明他的辩证方法，但他的许多信从者却强调一种观点压倒另一种观点。

表 1-4 进步用语

经济的	政治的	经济的	政治的
经济主义	唯意志论	霸权	反霸权
物质基础	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民主集中制	多元主义
阶级	集团	中央计划	市场
先锋队	联盟		

上文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危机以及东欧和苏联政权的倒台。在那些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明显衰竭的根源何在？至于失败的经验，显然，地位巩固的官僚势力是使得人们失去幻想的重要因

素。占统治地位的、以先锋队自命的共产党已经同人民没有联系。而且，马克思主义已到处融合进学术界，这就助长了陷于宗派口号与模式的倾向并使得言论、文章趋于混乱与晦涩。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对该危机的一项认真探讨中（1983）说明，自1974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国际资本主义秩序所形成的。他说，随着老一辈如卢卡奇、马库塞、萨特等人的去世，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自行发展。可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转向经验的、具体的研究，那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产生了至今仍有影响的贡献，诸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著作，哈里·布雷弗曼关于劳工与垄断的著作，米歇尔·阿格里埃塔关于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的著作，以及拉尔夫·米利邦德和尼科斯·波朗查斯关于资本主义与国家的著作，加上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以及罗德尼·希尔顿对英国编史工作的贡献，以及埃里克·奥林·赖特、尤金·吉诺维斯、埃里克·福纳、和罗伯特·布伦纳等北美学者的贡献。安德森相信那个危机是由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拉丁马克思主义引起的，表现为老一代左翼人士（以意大利哲学家卢西奥·科莱蒂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谴责以及对于与资本进行革命决裂的思想表示怀疑（波朗查斯在最后一次访谈中改变了他对双重权力的观点并宣称议会民主的优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社会中的没落以及在英语世界中的上升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复兴最终被英、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知识分子从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影响后退所纠正（安德森，1983，第18~20、30页）。

艾伦·米克辛斯·伍德在她关于今昔新左翼的最近年表中（1995）也综述了西方（新）左翼的兴起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随后退却以及劳工运动的没落。这一简史始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反斯大林，继而新左翼在英国兴起，终至共产党异见分子约翰·萨

维尔和 E.P. 汤普森在 1956~1957 年创办《新理性者》杂志及其在 1957 年与《大学与左翼评论》合并而为《新左翼评论》以及佩里·安德森、罗宾·布莱克本、汤姆·奈恩等人提升到它的编辑部。她把这种情况的特点描绘为从第一新左翼过渡到第二新左翼，并进而研讨这一左翼的分野与流派。

安德森认为，旧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大可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新理论。理论与实践可以在西方国家中结合起来重新集中注意世界经济、资本主义政府结构、社会阶级以及国家。安德森虽然承认转向具体问题并对于“革命运动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障碍而走向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进行战略讨论（参考书目 1983，第 19 页），他却相信，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资本主义堡垒，通过 1968 年以后校园造反和新左翼的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可以运转起来。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新察看历史思想家以及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收获，特别是英美：“宏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有效地告一结束，以显著的名声与信心代之兴起的，是另一类马克思主义文化，首先导向其前人所缺乏的有关经济、社会或政治秩序的问题。”（第 20 页）。

这种分析表示马克思主义通过利益与创造性的循环运转。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到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以根据革命运动的相互作用以及从正统到开放和折衷阐述的思想变化。最新的循环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群众运动高涨，接着是马克思主义在群众斗争中受孤立，以及转向改良主义和主流政治的潮流。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危机时刻活跃有力，它的活力与衰竭是和危急形势相连的。阿尔·西曼斯基以乐观的语气说，当正统派占上风时，批判性理论思想也出现，而当改良主义主宰时，马克思主义往往较少想像力和洞察力：“因此，可以预测，当前开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地位将被长期的经济萧条或战争所逆转”（1985 年，第 331 页）。

三、比较方法

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怎么看待比较？比较如何能有益于社会科学？在整个 20 世纪，学者们都在辩论这些问题。（见表 1-5）

表 1-5 主要辩论与转折点

	国际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
第一次辩论 (20 年代至 50 年代)	全球冲突处理 (理想主义) 对各国间国际关系 (现实主义)	欧美形态性传统研究对结构—功能性与系统比较
第二次辩论 (60 年代至 80 年代)	行为主义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新现实主义对学术多元主义以及范式的批判性评估	对于总数据的行为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关注对一种理论背景下的后行为规范的、历史的比较
第三次辩论 (80 年代至 90 年代)	实证主义, 包括理性选择, 概念形成对后实证主义及通过回顾性推理同早先观念决裂	实证主义, 包括理性选择对历史的单一和多种案例以及在一种理论背景下的后实证主义研究

来源：根据肖兰德与考克斯 1994 年著作绘制。

在 20 世纪前半叶，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论战是在以下两方之间：一方是受伍德鲁·威尔逊影响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由国际机制（如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约束的一个统一的全球社会；另一方是像汉斯·摩根索和亨利·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他们采取一种中央统制经济的、以权力为中心的全球政治的概念。比较政治学研究集中于诸如民族国家的形成、宪法、以及欧洲与美国的政府活动等主题。这两个领域的调研开始时往往是描述性的，后来结合理论与方法而设法提供更加系统性的认识基础。随着行为主义在 50 年代的兴起，注意力就集中到选择科

学方法与不受价值观影响的研究，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运动受到 60 年代期间伴随异见思想出现的历史循环论和规范性理论的行为主义革命的挑战。从 80 年代到今天，对范式的探索经历了第三次论战，这包含了：一方面是使实证主义观点精练提高和注重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是制订形成后实证主义观点和结合批判性理论。

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在美国，也考虑到我们的比较是否必须以实地研究为基础或者以正式或抽象模式为基础，前者结合了特定情况的历史与文化，后者的数据经过处理加工与假设测试。有时，这种辩论按照规范性或经验性理论进行。分析可能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在这些区分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是否真正科学的；人类行为是否可能预测。在 50 年代与 60 年代，行为科学试图以个人偏好的调查数据对此作出肯定回答。该传统继续至 80 年代和 90 年代，非常强调正规理论与理性选择，以至人们不清楚例如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需要成为既是领域专家又是科学家。

罗伯特·贝茨在一篇对这项辩论的有益概括（1997）中回顾了老一代学者和新一代学者之间的不同，前者研究过特定的外国国情与文化，后者醉心于统计数据与抽象的理论模型。查尔斯·林德布洛姆（1997）回顾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情况，批评那种认为政治学研究主要是科学的看法，指出它的主观和意识形态倾向一直持续到今天。罗杰斯·M. 史密斯（1997）发出警告，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开放社会科学，以保证各论战派系之间的多元主义与民主结果。弗朗西丝·罗思坦在此以前（1986）面对了社会科学研究流行模式中固有的局限和种族中心主义偏向并描述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的理论思潮。

说明这些局限的一项研究实例是诺姆·乔姆斯基（1990）力图表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及其后果以及美洲各国人民的不断

抵抗。另一个实例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 1914 至 1991 年世界的历史综合（1996）。该书分为三大部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希特勒败北；从 1950 至 70 年代中的增长时期；以及最近 20 年的历史。第三个实例是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在《历史的报复：马克思主义与东欧革命》（1991）一书中力求对 1989 年东欧剧变的必要性以及该地区不断发展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乐观态度提供一个不偏不倚的认识。他的观点不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而且揭示了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弱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由于转向自由市场或转向某种“后……”型模式而已经以某种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国家控制与调节经济的必要性。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导论性论文中，弗雷德里克·库珀和兰德尔·帕卡德（1977）追溯了社会科学中现代主义发展概念的演化，并指明了两个反对它的思想学派：认为市场解决一切问题的超现代主义派，以及主张发展意味着控制措施的后现代主义派。

对案例比较的定性与定量观点的例子甚多，但缺乏构成理论框架的材料。有两个例外，那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 宾厄姆·小鲍威尔和罗伯特·J. 蒙特合著的《比较政治学理论框架》（1993），以及詹姆斯·A. 比尔和罗伯特·L. 小哈德格雷夫合著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探索》（1973）。

某些主流政治学家成功地把定量观点同理性选择与形态模式结合起来，使他们能进入比较研究。对经验理论与统计分析进行以定量导向为主题的一项早期尝试，是菲利普·伯吉斯、詹姆斯·哈夫和劳伦斯·彼得森合著的《国际与比较政治学手册》（1979）。拉塞尔·多尔顿在《西方民主中的公民政治》（1988）一书中把调查数据同特选国家（美国、英国、西德、法国）的传统比较相结合。与此相对照，马克·凯塞尔曼与乔尔·克里格等人则在他们的《过渡中的欧洲政治》（1992）一书中集中于更广范畴的国家与地